

**编者语：**本期栏目发表三篇文章，暨南大学史小军教授师生的《吴中四才子咏物诗中的“物化”色彩》，深入探讨了“吴中四才子”物化文学观的深层“物化”状态，进而揭示了其不同一般的特点，在于不仅表现了物我界限的消解，更是一种生命的交融或体验；华南师范大学郑天熙博士的《“论文”与“明理”——论明代〈广文选〉〈广文选〉对〈文选〉的承变》，着眼于明代“文选”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以翔实而系统的分析、梳理和论证，概括了不同时期选本的特点，及其文选观对文选取舍的影响和表现；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周荣的《论李蓁〈元艺圃集〉宗唐复古的选诗倾向》，通过论证《元艺圃集》所表现的整体诗学观念及其产生缘由，肯定了在当时冷落元诗之时，这个选集的价值。特别感谢史小军教授多次携同其学生，对本栏目给予的支持！

## 吴中四才子咏物诗中的“物化”色彩

史小军，李 佳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吴中四才子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诗，他们善于对外在事物进行题咏，在这些诗歌作品中，有一部分具有明显的“物化”色彩，其表现或为个人与外物合而为一，或个人生命情感与他者相通。这种“物化文学观”与他们所处的吴中地理环境、时代氛围和个人经历等多种因素有关。而这些诗歌表现出的物化色彩也让吴中四才子的作品更加真实有情。

**关键词：**吴中四才子；咏物诗；物化色彩；物化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 (2020) 02-0073-07

**DOI：**10.14091/j.cnki.kmxyxb.2020.02.011

### The Sense of Materialization of Poems on Objects by the Four Talented Scholars in Suzhou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SHI Xiaojun, LI Jia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510632)

**Abstract:** Four talented scholars in Suzhou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Ming Dynasty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poems on objects, and they are good at writing poems about things in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se poems, some of them have an obvious sense of “materializatio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outside world or the interlink between the individual feelings and that from the others. The “materialized literature view” is related to the loc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atmosphere of the times and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etc. Therefore, the sense of “materialization” also gives the poems more true emotions.

**Key words:** Four Talented Scholars in Suzhou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poems on objects; the sense of materialization; reasons of materialization

吴中四才子是明中叶的一个文人团体，《明史·文苑·徐祯卿》称“祯卿少与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齐名，号‘吴中四才子’”。<sup>[1]7350</sup>四人或善诗

文，或善书画，或兼备，因此无论在文坛还是书画界他们都是相当重要的团体。再加上与其相关的故事颇多，广为流传，他们显然成为学术界不可忽视

收稿日期：2019-12-05

作者简介：史小军（1966—），男，陕西岐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李佳（1996—），女，四川南充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的研究对象。相关研究成果包括吴中四才子的诗文研究、古学追求、市民意识以及定名考论,等等。就诗歌而言,已有分别对唐寅、文徵明、祝允明和徐祯卿诗歌创作观念、艺术特色、美学风格等方面的研究。但综合起来看,目前还未有将四人某一类题材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本文将吴中四才子的咏物诗作为研究对象,寻找作品中独特的“物化”色彩的表现,并探索这种文学观形成的时代、地域以及个人等方面的原因。

### 一、关于“物化”

“物化”是庄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并且关键的概念,在《庄子》中多次出现。《庄子·齐物论》的最后一段写到:“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sup>[2]97</sup>陈鼓应先生将物化解为万物的转化,同时指出这是一种物我界限的消解。因此,物化不仅是一种结果,也是一种物我合一的过程与状态,是一种彼我同化的精神境界。人、物两分,可以通过物化进行联结。

除了《齐物论》,庄子还在《天道》《达生》篇中提到了“物化”。《天道》篇中写到:“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sup>[2]351-352</sup>陈鼓应先生将“天行”解释为“顺乎自然而运行。”<sup>[2]352</sup>“物化”即与外物融合。这里也呈现了一种“无为、自然”的“自化”状态。

此外,《达生》篇中写到:“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sup>[2]501</sup>这里的“指与物化”,陈鼓应先生解释为“手指与物象化而为一。”<sup>[2]502</sup>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曾说:“指与物化,是说明表现的能力、技巧已经与被表现的对象,没有距离了。这表示出最高的技巧的精熟。”<sup>[3]</sup>总之,无论是哪一处“物化”,都正如陈鼓应先生所指出的一样,是一种物我界限的消解,或是从梦境中得以显示,或是从技艺上加以显露,或是表现出一种生死的领悟。

万事万物都摆脱不了“化”的命运,即都要

经历生死消歇的过程。不管是莺燕、花草、蟋蟀还是人类,或是生命更长久的事物,最后都要经历死亡。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庄子的物化思想就不仅仅指人与物合二为一或者物我边界消蚀而形成的一种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的状态,此外,它更是一种生命的交融,即生命时间与自然时间的交融,从物象中反映出一种自我的生命体验与生命感悟。那是一种“与生命的交融之情,把所见之物心化,将客观世界与主体精神交融,使物带有生命的情感。”<sup>[4]</sup>以此观之,此处“物化”颇有一种王国维所说的“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sup>[5]</sup>的意思。庄子的“物化”是感通物我,通过“化”在物我之间建立起一种关联与感通,更深层则包含了一种生命体验。

### 二、吴中四才子咏物诗中的“物化”表现

吴中四才子作为明代重要的文人团体,就诗歌作品来说,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其诗歌贴近日常生活,纪游、杂感、消遣是他们时常书写的内容,或俚俗,或典雅,或任达明快,或沉郁忧怆。其中,对自然事物的书写成为了他们诗歌中的重要内容,在此过程中,从而将自然事物、个体生活与生命情感相连接,这也成为了吴中四才子咏物诗的鲜明特点。

吴中四才子的诗歌中有数量不少的咏物诗,他们将客观的“物”作为描写对象,或莺燕蟋蟀,或花草树林。因物而有咏物诗,因咏物诗而能摹尽物之体态,在两者互相成就的过程中,包含深深的情思和深刻的理趣。吴中四才子的咏物诗,具有鲜明的物化色彩。读其此类诗,由物始,至情深,而渐入思考。这是一个深入的过程,亦是物我界限消融、情感互通的过程。而这种界限的消融,在吴中四才子的咏物诗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一) 物我边界模糊

一是人作为实在的个体与物之间表现为一种合一的状态,边界模糊,友好交融。在吴中四才子的咏物诗中,其笔下的花草树木、莺燕鱼虫与人之间并无界限,同是平等的客体存在于世界之中,相关、理解与融合。总之,在吴中四才子的咏物诗中,物与人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边界。

唐寅笔下有数量不少的咏物诗, 似一切事物都可成为所咏对象, 包括莺燕虫鱼、花草林木。唐寅笔下的咏物诗展现的就是一个生动的世界, 人与一切事物共生共存, 自然相处。

在唐寅的咏物诗中, 最著名的可以算是其《姑苏八咏》之《桃花坞》:

花开烂漫满村屋, 风烟酷似桃源古; 千林映日莺乱啼, 万树围春燕双舞; 青山寥绝无烟埃, 刘郎一去不复来; 此中应有避秦者, 何须远去寻天台!<sup>[6]17</sup>

整首诗将桃花坞作为所咏对象, 桃花于其中, 千林万树, 花开烂漫, 莺啼燕舞, 人心悠然, 真是又一桃源也。繁花、莺燕、林木, 无一不与人合为一体, 于此境中, 人与繁华、莺燕同是作为大自然中的一部分, 并无二致。花开烂漫、燕飞莺啼, 它们都极富俏皮的性格, 花开满屋, 毫不怯惧。在这首诗中, 不仅从人的角度来看, 人与物之间的界限模糊了, 从外物的表现来看, 它们也模糊了自己与人的界限。而唐寅将此桃花坞比作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本就带有一种物我融合的意味。整首诗读来清新自然, 活泼灵动, 而无刻意雕琢的痕迹。

此外, 唐寅在《题杏林春燕二首》中也刻画了一幅和谐的人鸟图:

红杏梢头挂酒旗, 绿杨枝上啭黄鹂; 鸟声花影留人住, 不赏东风也是痴。<sup>[6]96</sup>

不论是红杏挂枝头, 还是黄鹂啼绿枝, 鸟声、花影、行人都能借此诗题于一画中, 毫无冲突, 归于和谐。此时, 鸟与花与人都是作为世界中平等的个体而存在, 并无差别。这是模糊了人与外物的差异性, 而强调同一。

类似的, 还有《咏蛺蝶》:

嫩绿深红色自鲜, 飞来飞去趁风前; 有时飞向渡头过, 随向卖花人上船。<sup>[6]116</sup>

此诗中, 蛺蝶与人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 两者并非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 而是无比和谐, 友好交融。在唐寅的笔下, 类似的诗作还有很多, 无论是竹、菊、莲花还是雪、溪等事物, 都在诗作中模糊了物与人的关系, 彼此边界消融。我们可以发现, 唐寅咏物诗中的莺燕、花草多是灵动活泼, 富有生机的。

祝允明笔下也有数量不少的咏物诗, 松、菊、

梅、竹、燕子、鹤鹑都是其所咏的对象。这些诗作也充分表现出人与其他生物合二为一的特点。

如《赏花漫言》:

花如人面面如花, 相对春风媚岁华; 忽觉莺簧花里啭, 隔花红袖试琵琶。<sup>[7]90</sup>

整首诗赏花咏花, 写出花朵的美丽与媚态, 但并没有花太多笔墨直接进行描写, 而是将花朵与人面、花朵与莺燕联系起来, 互为表现, 互相融合, 将几者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呈现。花如人面, 人面亦如花, 花的美丽与人面相交映, 以至于分不清何为花朵, 何为人面。莺啼鸟啭, 于花间嬉戏, 人抱琵琶, 隔花弹唱……读至此处, 花、鸟、人皆如处于一画之中, 媚态与灵气皆融于一诗之内。于此, 也消融了花之为花、鸟之为鸟、人之为人的界线, 共同处于自然之中。

此外, 《海棠鸟》中的鸟与人也呈现出一种融合的状态:

浴罢华清睡起迟, 翠衿零乱掩红肌; 胡雏似倚三郎宠, 偷看春窗未足时。<sup>[7]89</sup>

人鸟之间的界线被模糊, 鸟不畏人, 人不惊鸟, 物与人之间友好相融, 生动活泼, 富有趣意。诗中显现出的并不是人作为人和鸟作为鸟之不同, 而是强调同为生物的人与鸟的共性与和谐的状态。

唐寅有《桃花坞》, 祝允明也曾作《钱园桃花源》:

落英千点暗通津, 小有仙巢问主人。狂客莫容刘与阮, 流年不管晋和秦。桑麻活计从岩穴, 萝兔芳缘隔世尘。只有白云遮不断, 卜居还许我为邻。<sup>[8]202</sup>

两首诗都以桃花作为所咏对象, 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隔空呼应, 营造一种闲适恬淡的氛围和对这种生活的向往之情。虽两人诗作表达的内容有相似之处, 但却是从不同角度着笔。唐寅更多的是从桃花、莺燕的角度, 而祝允明更主要的是从人物生活的角度来展现人与外物合二为一。然不可否认的是, 唐寅和祝允明笔下的这一块天地都将桃花等外物将人合为一体, 共同构成了一种美好的状态。

总之, 在吴中四才子的很多咏物诗中, 无论是桃、菊、梨、柳, 或是蝶、鸟、莺、燕, 都与人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在文徵明和徐祜卿笔下, 竹、月、鼠、花等都与人合为一体, 物沾染了人的气

息，物作为物与人作为人的不同本质的界限已经模糊。作者此时已经不再用观物的眼光看待这些景物，也并不以将人与物区分开来的意识对待自己，从而模糊物与人的界限，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化”。

## （二）物我情感相通

除了作为实体的人与物之间的界限消融，徐诗中的物化还表现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体验的相通。

物与人有着相似的情绪与思想，两者间体现出生命的交融状态，或是一种自然时间与生命时间的融合。外在的山、花、草、木、鸟等都是生命的载体，带有生命的情感，是一种感通物我的生命体验，这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观念。

较为典型的要数若干首《落花诗》。其由沈周因丧子首作，其由沈周首唱，和者有文徵明、唐寅、吕常和徐祯卿等人。沈周的首作就决定了其忧伤柔美的情调，其他几人的和诗也或抒发了饱满的情绪，或体现了理性的思考。总之，诗作以落花为书写对象，夹杂无限的情思与感慨，或是离别愁绪、或是美人迟暮、或是对人生的理性思考。花开花败、落英满地是引发人这一系列情绪的基点。于此，花被赋予了情感，在诸首《落花诗》中得以牵动人心、荡漾情感，得以让人产生共鸣，人、物情感得以相通。

沈周作《落花诗》十首，随后，文徵明和徐祯卿各作和诗十首。都充分呈现一种物我情感相通的状态。如徐祯卿《落花诗》其三：

门掩残红树树稀，客车莅访雨中泥。蜂扳  
故蕊将鬓护，鸟过空枝破血啼。半月窗棂风不  
定，一川烟景日平西。先生卧病浑难管，收拾  
余英醉里题。<sup>[9]10</sup>

树树残红，蜜蜂故蕊，鸟啼空枝，落英满地，花已凋零，人也有无限苍凉与惜悯，忙着收拾余英。在诗中，人与花鸟并不是完全分隔，彼此的情绪与情感都在互通感受着。人的苍凉与悲伤的情绪由自然界的花朵凋零唤起，共通共感，而成一体。

又如《落花诗》其一：

不须惆怅绿枝稠，毕竟繁华有断头。夜雨  
一庭争怨昔，夕阳半树少淹留。佳人踏处亏鞋

薄，燕子衔来别院幽。满目春光今已老，可能  
更管镜中愁。<sup>[9]9</sup>

整首诗都笼罩着一层浓密的惆怅之感，落花飘零，夜雨簌簌，春光已老，镜中愁容。外在繁花的凋落与春光的消逝实际上都与作者内心的情感相连相通，作者已经把自我内心的情感与外在景物的情感合为一体，将自我的生命体验赋予外在花草，或者可以说是通过外在景物的盛凋唤起自己的情感体验，具体来说，此诗中由花朵凋零感慨美人迟暮而产生的无限愁绪厚重而悠长。此时，人自我的生命时间就与外在自然的时间、景物的生命相连，从而模糊了物的生命与人的生命。在此境况下，人与外在景物是作为共同的具有生命与情感的对象而存在。

此外，《落花诗》其六：

飘荡东西不自持，多情牵惹有飞丝。恩私  
漫忆曾扳手，精魄难抛未冷枝。每戒儿童绕树  
戏，空烦道路隔墙窥。经春为尔添惆怅，开费  
青樽落费诗。<sup>[9]11</sup>

诗中的落红飘荡、飞丝多情，春日惆怅，外在的景物无不都添上了人的情感，或可说是人自身内在的情感与飞丝、春日、树枝相连相通。总之，外在景物的生存时间与生命变化都与自身生命情感体验相通，人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呈现出一种与自然生命的交融之状，这是一种深层的“物化”状态。

唐寅《梨花》诗中也有这种物我情感相通之处：

一箱朱碧漫纷纭，独惜梨花一段云；病酒  
怜春两惆怅，夜深烧烛倚罗裙。<sup>[6]108</sup>

看见梨花，不自觉生发出怜惜之感，人物内在的情感由实体的梨花唤醒，梨花之为物与人之为人在广阔且虚无的生命之涯中都显得渺小易逝，同是作为生命的体验都有相通之处。在诗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这样一种花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与贯通。

祝允明《松寿》中“月明露下虬枝冷，不见人归见鹤归”<sup>[8]208</sup>以及《鹤鸣》中“长枕三郎作颂时，桂宫兰殿重含思。宁哥可是知人意，小院梨花玉笛吹”<sup>[8]211</sup>等诗歌中的松桂、梨花、鹤鸣等都与人内心的情感相联系。

此外，祝允明的《黄葵》和文徵明的《庭前

蜀葵》《玉兰花》等诗作中也明显地表现出这种人与物内在情感的交融和对生命易逝的体验。

如果说上一类带有物化色彩的表现是把自我融入外在景物之中, 从而模糊作为实物的自我与景物, 那么这种情况则是通过赋予外在景物的情感或者呈现人与外在景物类似的生命体验来模糊物与自我的界限, 从而以更广阔与更深沉的视角即生命的视角来观照物与我, 以此两者之间突显的就不再是物之为物我之为我的差异性, 而是共同处于生命大背景之下, 物与我也因此表现出了更多共通的地方。

在这些诗作中, 我们可以发现, 其所书写和表现的情感和生命体验多是伤感、遗憾、惆怅的。吴中四才子的一些咏物诗通过一定的方法模糊了自我躯体与外物的界限, 模糊了自我感情、生命体验与外在景物的情感之间的界限, 从而具有一种“物化”的色彩, 但他们对于生命的态度并没有到达一种完全的“达”的高度。

### 三、吴中四才子“物化文学观”形成的原因

吴中四才子咏物诗中展现了一个物我和谐的世界, 不仅是作为实体的物与人可以模糊边界, 融为一体。物与人的情感和生命体验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互感与互通。

吴中四才子的不少咏物诗都呈现出“物化”色彩, 其实这与“物化文学观”不无关系。所谓“物化文学观”, 何光顺先生解释为“物化中诗意言说世界向人的自行照耀与呈现, 也是人觉悟了世界万化归一的诗性本真后, 以文学方式向道化本源的一种自觉投入。故而, 人对世界的看, 已不再是对象化的孤立的看, 而是以文学的情感诗化方式达成的人与世界的和解与体谅。”<sup>[10]</sup>“道化生万物, 万物化而为道, 就是物化。在道的物化背景下观照文学, 就形成了庄子独特的文学观,”<sup>[10]</sup>即“物化文学观”。由此可知, 文学由道而生的品质决定了其求真、尚正的品质。在“物化文学观”的影响之下, 也要求创作的作品是具有真情实感的。

李梦阳曾在《诗集自序》中对民间文学进行了认可和很高的评价, 认为民间文学作品中有自然之音, 真切之情。以这点来看, 从吴中四才子诗歌中体现的“物化文学观”则与李梦阳的观点不谋

而合。从吴中四才子的诗歌作品来看, 无论是唐寅作品中口语化、民歌化的诗歌创作还是徐祯卿诗作中的淡淡忧伤, 其实都是一种真实与真情。这种“真”不仅仅是诗歌中描摹的对象真、表达的情感真, 更有一种在“物化文学观”关照下, 物与人模糊界限的万物一体的客观存在真和万物间共通的情感体验与生命体验的真。而由物化文学观到创作真诗, 再到诗中表现出的物化色彩, 均是吴中四才子咏物诗中体现的鲜明的特色。

而吴中四才子得以形成“物化文学观”,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实际是他们所处地域的熏陶、时代的镌刻以及个人经历的共同结果。

#### (一) 地域因素

吴中四才子咏物诗表现出一种物化的色彩, 模糊自我与外物边界, 并把自我情感和生命体验与外在自然生命与时间相联系, 这其实也是一种“多情”的表现。而其诗歌呈现这样的特点与其所处的吴中地区自然、文化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

吴中地处江南, 花草秀美, 佳木成荫, 鸟啭莺啼, 名胜众多。在自然环境之中, 目之所见是一片优美婉丽的景象。客观的地理环境和自然风光为吴中四才子提供了丰富的咏物诗素材。而相较于北方中原景物的豪迈、雄壮, 江南景物多是清新优美的。由此, 吴中四才子咏物诗中多是清新、林秀的自然美景, 莺燕花草是重要的描写对象。人所处于这样美丽的自然环境中, 面对这样的可爱景色, 更容易产生一种与外物的融入之感。此时, 人对外在事物的观照并不是完全分离的, 在优美的氛围中, 模糊两者界限。

此外, 从文化的角度看, 吴中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 诗画品评、温酒雅集、诗歌唱和, 情致迭生。地域特色造就了吴中的文化性格, 也深深塑造着吴中文人的内在秉性。吴中地区似有一种浪漫的氛围, 吴中文人对于万物的感受似乎也更敏感一些, 多了一种不分边界的融合。相应的, 这种书画传统、诗酒品评在沈周等人的身上早就有明显的显现, 莺燕虫鱼、花草林木都是吴中文人诗画中的常见对象。这也深深影响着吴中四才子的咏物诗创作。这不仅表现在吴中四才子作品中有数量较多的咏物诗, 也表现在在吴中文化性格的熏陶下, 吴中

四才子更容易将个人与外在事物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外在环境也能加深其内在多情的特征，因此能在与外物相处的过程中生发出对生命和情感的思考与共鸣，从而在咏物诗中多了一层浓厚的物我之间的生命情感体验。

吴中地区的社会状况也是促成吴中四才子形成物化文学观的重要因素。江南地区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让那方地域形成了一片富庶的景象，苏常熟天下足可谓是对其发达农业的高度肯定。自古以来，江南地区就似乎是一片相对富足的景象。韩愈就曾感叹过天下十分之九的赋税都出自江南地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达，更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也让城市有了多元、开放的文化，富庶的地区文化也影响着在这个地区生活的人们的心态，吴中四才子身上也因地区而被赋予了多元、开放的性格，甚至有一种不羁的狂放。吴中四才子并不单纯执著于对经济的追求，财富与功名纵然是吴中四才子追求的一部分内容，但同时他们也能享受生活，欣赏身边的万物，对外在事物的关注更增添了生活的乐趣。表现在诗作中就是外物皆能入诗，成为所咏对象。因此，吴中四才子创作数量不少的咏物诗，他们在诗作中将自己的情感与他物联系，并能从生命的大角度大背景下来观照外物，从而表达一种共通性与同一性。这样的内容也在客观上增添了诗作的情感性。

## （二）时代因素

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崛起，在意识形态长期处于权威地位的程朱理学开始松动，一些具有近代色彩的启蒙思想兴起，犹如一股迅疾之风，强烈席卷而来，影响着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大众群体。人们对个体的关注更加明显，个体意识更加强烈。大众包括不少的文人在内更多的关注世俗生活，关注个体生命。世界中的个人成为文人笔下重要的书写对象。向外，即表现是人作为个体的普通世俗生活，表现作为个体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向内，即关注并表现人内心的情感与生命体验，从而扩大到万物。当时出现的一些相对俗化的诗歌作品正是这种现实与人们心理的反映。对个体的关注、对生命的重视在诗作中就表现为对生命的敏感与情感的共鸣。

因此，吴中四才子有不少表现世俗生活和自我诗歌，他们一方面狂放不羁，突显自我，另一方面又在自我与外物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咏物诗中，于其中，不论是作为个体的人和外物，还是人与外物的生命情感体验，都是相连相通的。而在因物感发、情感相通的过程中，对物的书写终究回归到自我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外物与自我的生命联系。

其实，无论是对个人生命的关注还是对其他物体生命的关注，对外在生命的长度还是对内在情感的关注，这种模糊物我边界与情感的特点在吴中四才子的咏物诗中都有所体现，这也都与时代因素与文人心态的转变不无关系。正如笔者在《复古与新变—明代文人心态史》中提到的明中期士人的心态与前期迥然不同，“一部分人远离朝廷，放浪山水之间，在自然和艺术的怀抱中消释来自现实的苦闷。中期士人行为的多样化表明了心态的多样化。可以说，晚明士人的种种心态都可以在中期士人这里找到潜流。”<sup>[11]</sup>吴中四才子的这种心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晚明士人的自我与个性都能在吴中四才子身上找到影子。

## （三）个人经历

吴中四才子善于将自己的情感与外物相连，除了其多情的内在，也与他们各自的经历不无关系。《明史·文苑传》曰：“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sup>[13]3552</sup>一提到吴中四才子，即使给人们的印象是风流倜傥、潇洒自适的才子形象，但也不能掩盖他们生命中的惆怅与哀伤经历。唐寅放浪形骸，不为世俗所拘，但他经历过科考案，背负着无限的耻辱，也因为这样，让他对仕进曾经抱着强烈渴望的理想忽而破灭，转而成为一个狂诞之士。但唐寅认为人与物均有可取之处，他在《答文徵明书》中说道：“且操齐邪之行，驾孟浪之说……性灵既异，趋从乃殊。是以天地不能通神功，圣人不能齐物致……盖古人忘己齐物……”<sup>[6]170</sup>现实的打击让唐寅转而将自己投入所生活的世界之中，关注外物与生命。科考的打击在文徵明与祝允明身上都发生过。看似三人都为所拘，但虽经科考之痛，但他们对仕途并未完全放弃，仍怀揣希望，因此，

他们虽能物我互感, 潇洒狂诞, 但并未能达到一种完全“达观”的境界。

而于徐禛卿来说, 虽中进士, 但生活经历却为他加上了一层苦涩, “从生命个体的角度来看, 徐禛卿的人生经历充满着悲剧与痛苦。”<sup>[12]</sup>徐禛卿是典型的寒门子弟, 与唐寅、祝枝山、文徵明相比, 其既无丰厚的财力累积, 也无广博的人脉支撑, 凭着一己之力, 通过科举走进官场成为他唯一的出路。其高才能文, 却在应试中频受挫折, 虽失意之后终成进士, 但家庭贫穷、体质多病、丧母之痛、与父失和、殇女之悲, 种种遭遇无不一层一层剥蚀着这位文人的身心, 一颗坚韧的心已被实现价值的理想和焦虑冲击得千疮百孔。而此种种, 已足以使一个人的情绪与情感充满厚重的愁绪与伤感, 也让他对生命的理解不断加深。如果说中国文学史上有一种通达顺遂的文人, 徐禛卿应该不属其列。而生命, 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生命, 包括万事万物, 于他而言, 都有一层淡淡的忧伤。因此, 在吴中四才子的咏物诗中, 他们能将将自己的感情与生命体验与外物相通, 达到一种共鸣与交流, 但不少时候也弥漫着一层感伤。

物化让吴中四才子在看待外物的时候, 会有一种生命情感体验的物我转移或者物我交融的感受。这与庄子的“梦蝶”颇有相似之处, 不过庄子是通过梦来实现物与我的同化与物我边界的消融, 或者万事万物呈现的一种自然无为的“自化”状态, 即生命的消逝。吴中四才子是通过诗歌来展现一种物我交融和情感的共同体验与转移。但他们达不到庄子的状态, 对待生死做不到“箕踞鼓盆而歌”<sup>[2]462</sup>, 不能以自然无为的状态看待生死, 不能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大境界, 也正因如此, 在关于生命体验的诗作中, 有不少是对生命的珍视与流逝

的书写, 而不免有些许伤感与苦涩。

吴中四才子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诗并表现出明显的物化色彩, 或是表现为自我与外物合一, 或是表现为自我情感和生命体验与外物相通。总之, 人与外物呈现一种交融之状, 模糊了边界。这实际是其生活的环境、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共同作用使然, 也正是他们在将自我与外物融合的过程中、将自我情感和生命体验与万物连通的自觉中, 他们的诗作才显得更加真实, 他们的形象才在中国文学史上显得更加多情与可爱。

#### [参考文献]

- [1] 张廷玉. 明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 陈鼓应, 注译. 庄子今注今译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3] 徐复观. 中国艺术精神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128.
- [4] 崔秀霞. 徐禛卿吴中时期诗歌的意象系统与感伤化诗境 [J]. 德州学院学报, 2010 (6): 11.
- [5] 王国维. 人间词话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4.
- [6] 唐寅. 六如居士集 [M]. 应守岩, 点校.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2.
- [7] 祝允明. 祝枝山诗文集 [M]. 王心湛, 校. 上海: 广益书局, 1936.
- [8] 祝允明. 怀星堂集 [M]. 孙宝, 点校.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2.
- [9] 杜浩. 文徵明小楷 [M].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4.
- [10] 何光顺. 庄子物化文学观初探 [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2004 (2): 50-52.
- [11] 史小军. 复古与新变——明代文人心态史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38.
- [12] 崔秀霞. 徐禛卿诗学思想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42.